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鲁迅语萃

钱理群 编
王乾坤

华夏出版社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鲁迅语萃

1993年·北京·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

鲁迅语萃

钱理群 编
王乾坤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20千字 2插页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 7-5080-0138-9/Z·133

定价:7.80元

中國二十
世紀思想
文庫

啓功題籤





鲁 迅
(1881——1936)

总 序

张岱年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时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凌侵,全国人民奋起斗争,致力于救亡运动。20 世纪之初,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运动。1912 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是从此以后,谁要再敢建立帝制都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1915 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新的思潮风起云涌,对于陈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影响。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译述《天演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又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学说。梁启超更以通俗的文笔阐述新学,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章太炎鼓吹革命,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而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在文学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鲁迅,在文学史上具有卓越的地位。

20 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中西文化的异同,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胡适倾向于“全盘西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认识不足。梁漱溟起而以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梁漱溟刚直不阿,表现了

中国古代哲人的风范。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国事日急。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奋起抗日。一些学者致力于学术救国,从事于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创建活动。若干学人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融会中西的学说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学者的学说虽未必切合时代的需要,但其理论的深邃、论证的精密、与古代哲学家或西方哲学家相比,实毫无逊色,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经过抗日战争及国内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化学术又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给文化学术带来了惨重的灾难。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于是文化学术走上蓬勃发展的坦途。现在到了20世纪最后七年了。在这七年中反过来再看一下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过程是有益的。总而言之,20世纪是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学人辈出,群星灿烂,多家竞胜,蔚为壮观。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和复杂的时期,在研究中国20世纪思想史以及评价20世纪思想家时,要做到全面、深刻、客观、公允,确是一件不容易但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首先,是注意不要把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全部历史隔离开来,因为思想史与文学史、社会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同样在评价中国20世纪思想家时,要注意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特点,有其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其次,中国20世纪思想史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最“新”的一部分,我们应有历史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我们现在正处于20世纪的最后七年,研究这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既不能脱离

18、19 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又应注意中国 20 世纪思想史所具有的特点，还应想到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更新和光大。

再次，在研究、评价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时，要注意实事求是，切忌把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处世方式等相混淆，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之特点，把握学术思想演变中的主流，当然也要客观研究某些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估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中国 20 世纪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重点选择中国 20 世纪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为文化发展、民族振兴所作有意义的探索的思想成果，辑录成《新论语》丛书，每人一卷。编者均为国内学有根底的中青年学者。我认为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学术发展、文化建设将有重大的裨益。刘耿、王骏等同志希望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个人对于中国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观感，聊供读者参考。

1993 年 1 月序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编 序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鲁迅卷》是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为读者提供一个具有独特思维方式,独特思想命题,以及独特表达方式的“鲁迅思想”的尝试。

鲁迅曾把他的杂文称作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①,鲁迅的每一个思想命题都是有现实针对性,并且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鲁迅对于抽象的超越性的思想和范畴是没有兴趣的,他也从来不曾潜心地炮制过他自己的思辨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的思维只沾滞于具体的现实问题,并以此为满足。恰恰相反,鲁迅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的“博大的诗人”,是一位“不安于物质生活,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关注和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的根本问题的思想家,或者说,鲁迅是一位将现实关怀与超现实的形上关怀统一起来的思想家,他的每一个思想命题都是具体性、个别性、特殊性与抽象性、概括性、普遍性的统一,“这一个”与“这一类”的统一,都具有社会历史文化学与人类学的两个层面的双重含义。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编选鲁迅“论语”的工作,实质上就是将鲁迅思想命题中的普遍内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本书所辑语录。

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纠葛中“剥离”出来,例如从“两个口号”的具体论争中“剥离”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从对刘和珍与柔石等先烈的追怀中“剥离”出“记得”与“忘却”、“正视”与“逃避”的人生选择的基本困境……等等。我们并且期待,这种“剥离”工作有助于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兴趣、新的方法,去重读鲁迅著作,去重新发现过去多少被我们所忽视了的鲁迅思想中的普遍的超越的意义。

具体的,生动、形象的现象形态,不仅对鲁迅思想的形成,而且在鲁迅思想的表达上,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鲁迅是一个不用逻辑范畴表达思想的思想家,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思想不是诉诸概念系统而是现之于非理性的文学符号和杂文体的嬉笑怒骂,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细心的读者不难从我们编选的“论语”中注意到,构成鲁迅思想的基本单位(元素)的,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典型化的“单位意象”。例如,“死火”、“过客”、“影”、“无物之阵”、“墙”、“夜”……等等,甚至鲁迅小说中的文学形象和文学描写,也都成为某种人类精神现象的概括(暗示与象征)。正是这些文学化的形象、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其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其所显示的“文学”与“哲学”的交融趋向,正是本世纪人文哲学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鲁迅也显示了他的思想的“世界性”与“世纪性”。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不只一次地对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设置鸿沟的正宗观念产生怀疑并且想到,中国应该多一些左手写诗文、右手弄哲学的“通人”,我们设想(期待),未来人的性灵张扬也许会使哲学彻底改观,而使之成为诗化哲学、音乐哲学,也许只有到那时,思想家与文学家的鲁迅的“意义”才会真正被人们所认识,通感鲁迅的人也会多起来的吧。

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鲁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所有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世界本质”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回答。——如本书第一章所昭示，他提出了“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命题。和一般哲学家、思想家不同，鲁迅对世界本体的追寻是与他对于人生的探索、理解与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来说，“中间物”既是他对处于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个体“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历史地位的一种确认，又是他对于“世界本质”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是真正“鲁迅式”的：他在一封通信里，对于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津津乐道的“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这类问题提出了根本置疑，他认为这是“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是无意义的，至少应该悬置起来不予考虑的；他关注的是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方式，他于是发现了“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把世界的本体既不理解为“圆而神”的浑沌，也不理解为“周而复”的连续，而看作无限发展之链与中间环节的对立统一，世界是无限进化的、发展的，而这种无限是由有限的中间物来构成的。这样，他就从根本上确认，中间物与有限是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作为这一存在命题的反题，他又明确指出，“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但却是会将人“钉死”的“棺材钉”。这一结论（命题）对于鲁迅的思维是根本性的，构成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思维轴心或枢纽，由此而引申出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基本观念。鲁迅首先拒绝了“完美（善）”与“圆满”，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人生（艺术）道路的“极境”即“至善至美”性，进而确认了不圆满，有缺陷，才是历史、社会、人生、人性、艺术的正常存在形态，以至客观发展法则。鲁迅同时拒绝

了“全面”，断然否定了“毫无流弊的改革”，毫无偏颇的选择，进而确认了“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都是在偏颇中发展的，“斯失子与璧之德，而留者为空无”。鲁迅还拒绝了“永久(恒)”，否定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确认万事万物的“过渡性”，一切都是环节，中介，在具体时空下存在，并必然在另一种时空中丧失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这样，鲁迅就彻底地摒弃(拒绝)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关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那通常是处于现实苦难中的人们精神避难所，鲁迅却要杜绝(堵塞)一切精神逃薮(退路)，只给人们(以及自己)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及短暂、速朽，并从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我们说鲁迅是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应该在此。

从前述思想基本点出发，鲁迅对众多思想家津津乐道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历史发展的纵轴关系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特回答。当有人从历史的追忆中将“过去”净化与理想化，另一些人在想象中“将来”描绘成一个消弥一切矛盾与痛苦的“黄金世界”的乌托邦，鲁迅却冷然宣布，这一切全是虚妄。他尖锐地指出，“仰慕往古的，回往古代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在他看来，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他不关心彼岸的结果，最后的目的，更重视过程、重视历史发展中介环节，由“此岸”到“彼岸”的现实道路；而对于这一过程中所必有的矛盾、痛苦，又有着高度的敏感与充分的自觉。正是这超越目的、重视过程、执著现在的人生态度(与选择)构成了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又一个重要侧面。

当鲁迅确认：完善(完美)存在于不完善(不完美)不圆满之中，全面存在于片面弊端之中，永恒(不朽)存在于暂时(速朽)之中时，他就在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从事物正、反、表、里等多样性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思维方法，鲁迅说他“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

虑”，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仔细”，即努力追求对对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的精细观察与思考，并且从这些不同方位的观察的综合中，得到对对象的全面认识，把握事物的丰富性与具体性；另一方面则是“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努力窥探、洞察人们表面行为、言辞背后的隐秘心理，从表面的外在的圆满中揭示出内在的不圆满来。鲁迅由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在这普通地“欢迎喜鹊，憎厌枭鸣”的时代，偏做“枭鸣”，或者像那株“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的枣树，给“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们以“小不舒服”。

应该强调，鲁迅在确认不圆满、缺陷、有弊是万事万物的存在常态时，绝不是对这种“常态”的认同。“不安于现在，不满于现状”，这才是鲁迅的真正本色。他的“执著现在”，是为了要改变现状，而揭露现状的缺陷，不圆满，正是变革现实的第一步（前提）。这一方面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否定”是“理想之光”照耀下的“否定”。他在确认此岸世界的不圆满性，执著于现在（此举）的同时，并没有舍弃对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

事实上，在鲁迅的感情世界里，并非没有矛盾与痛苦。鲁迅不止一次地表示难以摆脱“怀旧”的“蛊惑”，他也曾设想过“致人性之全”的乌托邦，他的心底的另一角何尝没有一个和平、静穆、宽容、慈悲的价值世界。尽管鲁迅在历史与价值，理性与感性的心理冲突、煎熬中，终于没有落入乌托神话与幻想，而最终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但他从来不否认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更不会将自己所作的选择理想化、神圣化与永恒化。

这正是鲁迅思想的真正彻底处，他在粉碎“普遍、永久、完全”的乌托邦时，也粉碎了关于“自我”的“完美”、“不朽”的一切神话；他在完成了一种别于祖先前辈的思维的 and 人格的革命贡献了一种走向未来的新文化范式的同时，更也就为新的有限、新的范式无限地敞开了自己，在他人后来者的自由创造与否定中延伸着自己的

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间物”的命题正是鲁迅对自我价值的一个历史的确认。基于这一认识,本书不试图构造毫无偏颇、缺陷的鲁迅思想体系,也不徒然地将鲁迅思想整合化,我们努力提供给读者的,将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能够成为新的范式的起点和挑战对象的“鲁迅思想”。

三

对于“人”的关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说鲁迅思想是一种“人学”,在这一点上,实现了思想家的鲁迅与文学家的鲁迅的内在统一。更具体地说,鲁迅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现象,他早就说过:“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鲁迅尤其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在本世纪的领先思想在于此,与20世纪世界思想家的契合与独创处也在于此。

鲁迅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体察与探讨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首先是对从“此”(生)到“彼”(死)的“生命的路”的体验与理解。在这里展开的是“生”与“死”的中心命题。对于“死亡”,鲁迅一方面从“人”的群体体验出发,感受着一种“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生命进化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从“人”的个体体验出发,又感受着生命无可避免的消逝的悲剧性,人的一切挣扎终不免毁灭的。绝望、深刻在鲁迅的“死亡”体验里,就这样同时交汇着希望与绝望,理性与非理性的两股激流。而尤其构成鲁迅体验的独特性的,是他“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把“死亡”转化为对于“生”的思考,于是,他宣布他因为生命的“死亡”而证明了生命“曾经存活”和“还非空虚”,他因此而“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但当鲁迅转向对于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追问时,他却发现了“困境”:这是只能在“冻灭”与“烧完”中选择的无可

奈何的存在(“死火”),是“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彷徨于天地”的无可依托绝对孤独的存在(“影”),这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无归宿的荒诞的存在(“过客”),只在“荒原”中“挣扎”,发出惨伤的嗥叫的绝望的存在(“受伤的狼”)。鲁迅即使在他曾经向往的“战士”的生命里,也发现了因为面对“无物之阵”,终于“不是战士”的无意义的荒诞、无聊与悲哀。鲁迅进而由“生”的绝望与荒诞发现“死”的绝望与荒诞:人对自己“怎么死的”、“怎么到这里来”同样“全不明白”,人不但“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同样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即使在“死后”也依然逃脱不了被迫害、利用的命运。这样,鲁迅就堵塞了人们“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最后一条“退路”,把他的人的生存绝境的命题正视发挥到了极致。

当鲁迅进一步从“人我自他”即人与外界的“关系”中去体验、探索人的存在时,他的内心依然交织着两股生命之流:从人的群体体验出发,他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正是从与群体存在的血肉联系中发现与肯定了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且产生了对“他人”(群体)的亲切感、关怀和爱,以及交流与沟通的欲求。但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却感到了极度的孤独,他发现一堵“高墙”将自我与外界、他人“各个分离”,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已经简化为“求乞”与“布施”,这两方面都一样的令人“烦腻,疑心,憎恶”;他进而在“人我自他”的关系中发现了既“吃人”又“被吃”的双重残酷,发现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就仿佛置身于“看不见的地狱”之中。这种孤独与恐惧感也将鲁迅的生命体验推向“绝望”、“虚无”的极致。

但鲁迅的思想是真正彻底的:他对这“绝望”、“虚无”的生命体验本身也投以“怀疑”的眼光,他于是提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命题。一面宣布自己“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同时又承认“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他

正是在“绝望与希望”(以及相应的“充实与空虚”、“记得与忘却”、“正视与逃避”、“真实与说谎”)的矛盾、挣扎中选择着、调整着自己的生存态度与人生之路。在承认自我的有限,他人的可疑、可怕与世界的残酷、荒谬的前提下,在“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以后,他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存态度,选择“反抗绝望”作为“从此(生)到那(死)的现实道路。对达于“绝望”的人的生存困境与命运,既是正视,又是挑战,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鲁迅之为鲁迅的“特色”,将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家既联系又区别开来。

鲁迅前述生命体验的两个侧面——群体的体验与个体的体验,实际上正是根源于(或者说显示了)他对人的本质的两种把握方式(与思路)的。一方面,从“类”的方面去把握人,强调人的社会性、民族(国家)性、阶级性,以及最高层次的人类性,把人的发展与进化学说相联系,追求人类共同的理想、价值、利益、要求和互爱,由此而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则从“个”的方面去把握人,即把人看作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非群体(家庭、社会、阶级、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普遍的、观念中的人,因而强调“人各有己”,“联归于我”,个体的、自我的独立不依他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个性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正是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与前人相比最醒目的特征。他大声疾呼,要“以自己为主”,“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自己负责”,而无须“上帝来主持”,全力维护个人“特立独行”的思想(精神)自由与行动自由;他坦然宣布,“至今未能牺牲小我”,自觉地理直气壮地争取与维护个人的物质利益、个人欲望的满足以及个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鲁迅对形形色色的血缘、宗法、集团主义的革命,是一次“把人的关系还给人”的自觉努力。鲁迅在为“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与尊严热情辩护时,自然没有忘记个体的人对于群体的义务与责任;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人类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

知识分子，他尤其不可能忘记这一点。鲁迅甚至是主张先觉者“肩住黑暗的闸门”为后来者“牺牲”，但他仍然有一个限度：“被利用无妨，占有是不行的”，“牺牲”决不能以消灭人的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为代价，在鲁迅那里，战士（真正的人）与奴隶（奴才）的界限始终是十分清楚的。也正是出于对于人的“群体性”、“人类性”的自觉体认，鲁迅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相爱的人道主义理想也是倾心向往的，鲁迅从来不否认自己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与同情；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鲁迅清醒地看到人道主义者理想的虚妄，即所谓“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拂）戾初志远矣。”他一再强调，“人道”是要看对象的，当对手不“费厄”，不人道，不宽容；“费厄泼赖”就只能“缓行”，鲁迅因此而留下了“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的遗言。人们往往把鲁迅的“复仇”精神简单化，而不愿正视鲁迅内心世界的波澜。其实鲁迅早就谈到“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相互消长”，“爱”与“憎”的“纠缠”，谈到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的矛盾，而这一切正是根源于“人性的矛盾”的。而惟其有了这些内心矛盾与冲突，也才有了“真实的人”的鲁迅。

正因为鲁迅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因此，他的内心保存着“人性的矛盾”，毫不掩饰自己主体精神中的“人性之偏”。他公开宣称：“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并且因此而宣布与“静穆”无缘，对于漂渺、幽远的美的拒绝。他知道“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他因此而自觉地呼唤“真的恶声”，提倡“力之美”，追求“天马行空的大艺术”境界——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于“完美”的破坏，鲁迅也就因此赋予不完美、不圆满以及恶、偏颇、粗暴、力等人的生命意志以一种审美的意义，我们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美学是借美学符号表达的生命哲学。